

7月6日,10位老人被新认定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日本在南京实施了大屠杀,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是如此毋庸置疑。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包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本731部队拿中国人做人实验”等在内,首次发掘并公开这些日军罪行的,是日本研究者。

令中国人肃然起敬的“日奸”

本多胜一:让南京大屠杀进入集体记忆

日本各版本历史教科书中,即使在中日两国都被认为是右翼史观的扶桑社版教科书,也不敢不提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国民历史记忆,首先当归功于《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1971年,本多胜一获中国政府许可,踏上了调查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采访之旅。他的采访以连载方式在发行量近千万份的《朝日新闻》刊出。当年11月4日到11月16日之间的10篇报道涉及南京大屠杀。本多胜一的采访结束后,报道集以《中国之旅》为书名发行。

本多胜一在发行量巨大的《朝日新闻》上连续发表损坏日本形象报道,自然引起右翼人士的不满。有人给他打恐吓电话,还不断骚扰他的家人,这让他不得不搬家。而当年“百人斩”凶手的家属更是将他告上了法庭。最后法院作出了公正的判决,驳回了他们的上诉。

常石敬一:揭露731魔鬼行径

今天,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人不知道侵华日军的“魔鬼部队731”,但少有人知道,731部队并非日本战败之后罪行就大白于天下,它是二战结束30多年后,通过常石敬一最先开始的艰苦调查,才逐渐为世人所知的。

1943年出生的常石敬一教授是当时知道731部队为数很少的人中的一个。1966年他从东京都立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科毕业后,在长崎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在调查化学生化武器的历史和现状时,常石敬一无意中发现,旧日

本军在这些领域实际上处于尖端地位。常石敬一在研究中发现,各总军(旧日本军的一种编制,像关东军就是一支总军)基本上都有专门研究化学生化武器的机构,其中以关东军最为发达,而且他们的研究手法也是最惨无人道的。那些当年的罪犯在美国人的庇护下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和处罚,反而都成了日本医学界和制药界的权威人士。常石敬一下决心要揭露这些人。1981年,当时还只是长崎大学讲师的常石敬一出版了《消失了细菌部队》一书,揭露731部队的存在。但长崎大学没什么影响力,加上几乎没有什么宣传,这本著作乏人问津。

为取得更有效的宣传,常石敬一想到了社会派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森村诚一为写好此书,除运用常石敬一的研究和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秘书下里正树的采访笔记外,还远赴中国、美国进行调查。1985年,森村诚一的著作《恶魔的飨宴》出版发行。森村诚一的书中,不但详述了恶魔集团731部队的由来、编制和罪恶的研究项目,还把整个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和化学战研究机构梳理得清清楚楚。其中最著名的恶魔部队731,由此开始广为人知。

井上清:“归还”钓鱼岛的日本人

今天,钓鱼岛仍是中日关系的热点。但很少人知道,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最有力的证据,几乎全部出自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研究成果。

井上清,1913年生于日本四国岛的高知县,193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

文学部国史科。作为日本近代史专家,井上清教授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日本人对钓鱼岛所使用的日方名称“尖阁列岛”,是于1900年由冲绳县师范学校的教师黑岩桓命名的。这引起了井上清教授的研究兴趣;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钓鱼岛就很有可能是日本趁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混乱从中国抢来的,这样,根据日本在1945年接受的《波茨坦公告》,该岛就应该无条件地归还中国才对,怎么倒在1970年代又成了领土争端?1972年2月号的《历史研究》月刊上,井上清发表了《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的文章,这是他关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第一次公开论述。当年5月4日,《人民日报》以新华社电讯的方式在头版发表了《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发表文章,钓鱼列岛(“尖阁列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全文翻译了井上清教授的文章。从此,井上清教授提出来的论据就成了海峡两岸的共同论据。

井上清研究钓鱼岛的书出版之后,经常接到恐吓电话和信件,许多人让他闭嘴,不然就要如何如何,但是井上清说,“听得多了就习惯了”。2001年11月23日,88岁的井上清去世。

(据《国防时报》、《新华每日电讯》)

(编辑插嘴:日本有一个词叫“非国民”,对照中文“汉奸”一词,可翻译成“日奸”。本文这些日本研究者,在当时正是被冠以“非国民”称呼的主要人群。而他们,恰恰是令所有坚持正义的人都肃然起敬的人!)

“战神”栗裕8分钟打败日军

1939年初,日军开始在南京、镇江、芜湖三角地带进一步增强兵力,采用攻守并用的战术,深入重要集镇,构筑“梅花桩”式的据点,对新四军的茅山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而国民党又抛出了“画地为牢”的毒计,规定江南新四军只能在江宁、句容、丹阳、镇江、当涂、芜湖一带活动,其本质就是为了限制新四军发展壮大。

为了争取更主动的局面,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栗裕决定亲率第二支队第三团,远程奔袭,拔掉位于安徽芜湖近郊日军飞机场外围扁担河两岸的官陡门据点。

1939年1月18日清晨,栗裕作了简短的动员后,就率领部队轻装出发了。为了不暴露行踪,部队在冒雨北进25公里后停止行动,隐蔽宿营。

19日下午,栗裕组织部队悄悄上船,突然转向西开,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偷偷渡过丹阳湖。部队翻过湖西岸的

堤埂后,立即换乘早已预备好的几只装肥料的船,继续隐蔽西进,于午夜时分到达预定地点集结,整装待命。此地距官陡门还有近40公里的路程。

20日下午5时,栗裕带领部队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向西疾进。晚8时,按战前部署,掩护部队从南、北两面向青山和黄池的敌人据点隐蔽前进,以保护攻击部队的侧翼安全;攻击部队继续向官陡门搜索前进。

21日子夜,官兵们饿着肚子在黑夜中急行军,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头道桥据点后,于4时许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距官陡门约2公里的王石桥。按照预定作战方案,栗裕率攻击部队主力冲过桥,从西向东打;另一部沿河东岸北进,实施夹击。在冬日黎明前最黑暗、最阴冷的时刻,据点里的敌人正躺在暖暖的被窝里睡大觉,栗裕果断命令部队出击。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冲锋号声和“缴枪不杀”的呐喊声响起一片。接着,东岸

部队的机枪也打响了。攻击部队迅速突破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冲进据点。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还没有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打得人仰马翻,甚至有的敌人还没穿好衣服,就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趁着敌人惊慌失措之际,栗裕指挥部队一鼓作气,冲到河边,夺取了小木桥,占领了伪军司令部。伪军残部乘夜四处逃窜。

整个战斗只用了短短的8分钟,连同清扫战场总共用时20分钟。当周围的敌人明白过来,纷纷向官陡门据点增援时,栗裕早已率领部队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安全撤走了。奇袭官陡门,新四军大获全胜,以轻伤2人的微小代价,歼敌300余人,其中俘敌57人,还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

此战,让日军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新四军是个神,你打他时一个也没有,他打你时都出来了。”

(据《解放军报》)

1938,中国空军“夜袭”日本

抗战初期,日本飞机在我华夏上空横行肆虐,不可一世;日机比较先进,明治维新之后,他们全盘西化,制造大批武器准备打仗,如侵华的武器全部为国产,包括零式战斗机都是日本自己制造的,所以取得空中优势。相对弱小的中国空军只能被动应战。战前陈纳德检查国军飞机,在战机名单中编列的战机有200多架,再加上航空公司运输机有500架飞机,其实能执行战斗任务的只有90余架。面对日本狂轰滥炸,最高当局决定,派中国的飞机深入日本“纸片轰炸”——用投传单的方式唤醒日本群众,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

徐焕升(1906年—1984年),上海市崇明人。江苏医学院肄业,黄埔军校第四期、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曾赴德、意航空学校深造。初任笕桥中央航校教官、蒋介石座机副驾驶、分队长、中队长,1938年任空军第十四队队长,这时他要完成一个伟大的任务。

1938年5月,中国空军战士徐焕升、佟彦博远征日本本土。远征日本的飞机选用的是两架美制B-10型轰炸机;这种飞机装有两台功率为775马力的发动机,航程1900公里,可携带1025公斤炸弹,每架乘员为4人。1403号机为长机,由徐焕升驾驶;1404机为僚机,由佟彦博驾驶。黑暗中,八个人整齐地排成一列,发出庄严地宣誓:“为吾中华,抗日救国,飞渡重洋,远征三岛。以吾神鹰,警告日寇,唤醒人民,制止战争。”23时48分,跑道两侧突然亮起了杏黄色的跑道灯。接着耳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命令:“起飞!”两架战鹰呼啸着腾空而起,消失在遥远的夜空,横跨东海,向800多公里外的日本本土飞去。

2时45分,两架飞机以3500米的高度飞临九州的重要城市长崎市上空。长崎市是日本空军重要的出击基地。市内设有四处军火工厂,同时也是日海军基地。次日,长崎市民走出屋外,惊异地发现空中落下无数纸片,用日文醒目地印着:《中华民国国民众告日本国民书》、《中华民国总工会告日本工人书》。也有警告传单:“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药矣,尔其戒之!”双机按预定目标依次飞临久留米、佐贺、熊本及九州各城市,撒下传单上百万份,在日本本土上空飞行近2个小时。日本后来画了一组漫画,描绘中国这次“纸片轰炸”,亦称为“人道远征”行动,徐焕升、佟彦博也由此记载在民族英雄的史册上。

(据《羊城晚报》)